

*The Darjeeling Distinction: Labor and Justice on Fair-Trade Tea Plantations in India.* Sarah Besk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233pp.

丁玲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Besky在本書中通過豐富的文獻和民族誌材料，考察了印度大吉嶺的茶葉生產，她以James Scott的「道德經濟」為關鍵詞，講述了世界上最貴的茶之一——大吉嶺茶的社會生命故事，為讀者展示了發生在該地區的文化和社會變遷。除導論和結語外，本書可分為「過去」和「現在」兩個部分。其中，講述「現在」的3、4、5章，是在與回憶「過去」的1、2章對話，作者重點分析了該對話的發生過程及結果。

自殖民地時期開始在大吉嶺地區形成的茶葉經濟一直是該地區的經濟支柱。不同於其他經濟人類學研究對生產和流通環節的關注，Besky在有關奢侈飲料的個案研究中，引入了「食品體系視角」（food system perspective），強調促成生產和流通的物質條件——種植園的重要性，這對於瞭解印度茶業在全球食物體系中的位置尤為關鍵。在印度和大部分的後殖民主義世界裡，種植園農業仍佔支配地位，但卻很少有研究從勞動者的視角來觀察和分析作為社會和生態形式相結合的種植園。Besky的研究則彌補了這個不足。

本書的另一大貢獻在於探討了什麼是「公義」？面對土壤衰退，品牌競爭等現實情況，為了拓展市場，大吉嶺人嘗試了三種區隔方法，分別是地理認證，公平貿易以及民族自治運動來進行改革，試圖走出經濟困境，找回「公義」。Besky認為應該從不同的行動者角度出發看公義是如何被「執行」的。比如，對種植園所有者和管理者來說，公義意味著產權，價格和利潤，但對茶園和工廠裡的勞動者來說，公義的理念源於道德經濟的義務與責任，是同土地、尊重、穩定的經濟體系分不開的。90年代以前，採茶人依附莊園主而生存，90年代以後，經濟制度的轉型將勞動者同國際市場以及消費者聯

繫在一起。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曾經保障勞動者生活的道德經濟體系日漸崩潰。大吉嶺的茶農要求的公平和正義是一種穩定的生活模式，包括基本的物質保障和勞動身份的認同。因而這兩種公義是相對立的，前一種公義的實現建立在對後一種公義的踐踏和摧毀之上，是「不公義」的。

在導論中，Besky從歷史和經濟的角度，概述了茶葉生產對大吉嶺地區的重要性。在第一章「大吉嶺」，作者描述了大吉嶺近150年來複雜的歷史、政治和生態背景，以帝國主義的遺跡，即殖民地時期英國統治者留下的各種基礎設施建設為線索，講述了大吉嶺以及茶葉種植園的發展歷程以及土地與人的親密關係。在第二章「種植園」，作者詳細描述了殖民地工業時期的三方道德經濟體制。在工業時期，莊園主為種植園區提供包括醫療、水電、教育等在內的福利結構和資本再投資，作為回報，採茶人則接受相對較低的工資，並照顧好種植園的農業環境。工人、土地和管理者三方的關係是一種真假參半的親屬關係，是以關心、服務為基礎的「和諧」關係，三方一體的道德經濟形成了勞動者所理解之社會公義的基礎。作者認為，殖民時期，虛構的親屬關係和真實的經濟關係保證了大吉嶺的繁榮與穩定，且這種互惠的關係可以約束和調節不公。

隨著種植園生活的變遷，面對21世紀的消費者們，大吉嶺人重新打造品牌，但在重塑的過程中，當地的環境、歷史以及社會政治等因素卻被忽略了。在接下來的三章，Besky追溯了三種通過區隔大吉嶺，欲將公義和現代性帶入種植園的嘗試，分析了外界對第三世界農業的想像遭遇種植園的現實情況是如何失敗的。

第三章「地理認證」（Geographical Indication）。這章講述了大吉嶺茶葉，作為一種工業化的農作物，如何被包裝成一種獨特的風土產品，以及種植園的勞動力如何被國際規則重鑄成「傳統知識」。地理認證以知識產權制度為核心，通過地理認證，大吉嶺茶葉和茶人的知識變成了印度的民族遺產。這種只關注產權，而不關注勞動者眼中的公義是什麼的認證，並沒有給勞動者帶來實際利益。

第四章「公義」講述的是公平貿易認證（Fair-trade Certification）的故

事。在公平貿易的認證者看來，「公義」應該由市場而不是政府或其他組織主導，這種帶有新自由主義傾向的公義，鼓勵勞動者不要依附於他人，要抓住全球化經濟中的機遇，形成自己的事業。然而，大吉嶺的採茶人對這種「商業策略」頗為反感。作者將這種「美好的願望」的落空歸因於公平貿易的政策缺陷。首先，公平貿易所主張的「消費拯救貧窮」的理念，改變了原有道德依託關係，為所有者提供了藉口，他們不再向勞動者提供各種福利保障。其次，消費者多付的錢並沒有流向勞動者的口袋，而是直接進了所有者的腰包。儘管所有者在認證機構的要求下成立了聯合會以監督利益分配，但實際情況是，聯合會的成員大多由所有者任命，因而名存實亡，毫無監督力度。這種不透明的分配制度完全顛覆了公平貿易的本意。最終，這種試圖消除不公的認證制度，反而逐步瓦解了當地生活的穩定性，加大了所有者和勞動者之間的貧富差距。

如果說前兩種區隔運動都是由外部施加的話，第五章「主權」講述的則是在大吉嶺地區發生的廓爾喀民族自治運動，是由內部發起的自我區隔。過去，廓爾喀人為殖民者服務，得到了經濟保障和社會認可。自1947年印度獨立以後，種植園便交由印度人經營，他們不僅邊緣化廓爾喀人，而且也不再提供任何保障。在印度的民族國家的語境裡，廓爾喀人（Indian Nepali）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一直飽嘗身份危機的折磨。要求單獨成立廓爾喀邦的運動從80年代起從未停歇。但當運動領導者們獲得了半自治的權力來管理該區後，卻逐漸丟失了獨立城邦的理想。半自治的結果令大吉嶺人感到不滿，在他們看來，民族獨立，爭奪土地是公義的前提。只有自治了，他們才能回到道德經濟體系中，找回曾經的穩定生活。Besky批評了自治運動從不表達勞動者的訴求，也不關注種植園體制改革，從而使得運動流於表面，沒有涉及經濟不公和自然資源問題。

在結語中，Besky強調要從歷史和勞動者的角度看問題，她深入到當地人的生活中去，從長期相處中了解勞動者的看法和想法。她發現工人早已看到他們的困境是由於工業到商業的轉型造成的結果，但沒有一項運動關注過勞動者對種植園現狀和未來的理解。因而，強調知識產權的地理認證，提倡消

費者買單的公義貿易，以及隔靴搔癢的自治運動，其結果只能是大吉嶺茶葉價格上漲，新市場得以開拓，但利益都被所有者奪走，勞動者的生活保障和社會地位卻日益低下。

在作者眼中，歷史雖是過去之事，但更是一種延續，存在於現實之中。Besky強調過去同現在的重要聯繫，提醒讀者歷史可能會塑造當前的社會結構以及有關於後者的想像。作為一名人類學家，Besky沒有從抽象的概念入手，而是認真研讀歷史，並親身參與大吉嶺採茶工人的生活、勞動，來分析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和掙紮。在寫作手法上，作者將嚴謹的邏輯論述與生動的生活實例結合起來；比如每章以一個生活故事開篇來引出章節主題，構思巧妙，值得參考。總之，這本民族誌對研究勞工、全球化、第三方認證以及道德經濟等問題都有借鑒意義。而面對自治運動的失敗，大吉嶺人該何去何從，「公義」該何處尋？是爭奪政治上的主動權還是在經濟手段上另謀出路？期待作者日後能就這些問題作出更深入的探討。